

来，都装成老百姓，对少数路过的军政人员，就在密林茂竹中偷袭。双流贯匪曾炳章，新津巨匪李元亨、倪九皋，大邑余如海（原川军旅长），恶霸李鹏举、杨文彬，巨匪郭保之、孔立川等土匪袍哥相互窜联纵横勾结在一起，曾一度占据大邑县城，口称要杀尽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杨文彬自任大邑县的县长。原在大邑的地下党人陈曦等10余人被李鹏举杀害。一时匪势猖獗，嚣张已极，抢劫汽车、仓库，阻断交通事不断发生。

崇庆县元通场黄氏宗族，是集军阀、官僚地主、恶霸、袍哥于一家，其兄弟叔侄专横跋扈，奸淫估霸，任所欲为。这一地区早已是有名的“元通国”了。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黄氏家族恐慌万状，已感到末日将至。因此他兄弟叔侄并鼓动一些袍哥，土匪积极参加游干班受训，毕业后，将该地县立中学师生强迫离开学校，由黄家主持在校址开办“崇庆自卫训练班”，由军统特务雷清尘灌输反共思想，由黄鳌、黄润琴召集该县青年600多人前来受训，以作反共骨干。又在该县强迫预征全年粮额三分之二作为应变粮，又向民众强征5万元大洋，作为应变军费，由黄润琴任反共救国军司令，于1950年5月参加川西暴乱，夥同大邑余如海，李鹏举等匪对征粮工作人员残酷的杀害。又该县另一股匪首李泽儒在游干班毕业时，他领的枪弹最多，武器精良。在参加土匪暴乱前，已经在起义的新12军当团长，由军事代表领导下驻在新津、崇庆比连地区的花园场、三江口一带。李泽儒既得到王旭夫的命令，又得到联峰码头的上吩咐，即枪杀了该团的军事代表，将该团拖来与新津土匪会合。

新津县的李元亨、袁树江、田子成、倪九皋等原是地方的恶霸、地主，都是革命的对象。解放前夕参加游干班受训。故解放初就北联崇庆的李泽儒，西联彭山保胜场匪首杨希州、郑必初，南联乔子均，纠集四、五千人先抢走飞机场的武器，袭击人民政府杀害很多工作人员。在军事代表李芳、县长刘致台的及时清剿

与政治攻势下，很快平息。活捉匪部师长田子成与李元亨等，缴获重机枪8挺、炮4门、步枪、手枪约2000支，子弹几十万发。在这次清剿土匪暴乱时，政府工作人员秦世禄等共产党员10余人全部被杀害于新津与大邑接壤的沙渠镇。

原在名山、邛崃当过国民党县长的任和平，在49年底忽然带着几个随从，携电台一部，跑到成雅道上频繁活动。赓即邛崃牟场著名的总舵把子袍哥乔子均伙同西崃场袍哥头子杨万和及名山的张国运、汪汇云等都奉了任和平的委令，响应新津大邑、崇庆的叛乱。同时天全，芦山的惯匪程志武以“新编14军军长”的名义纠集人枪1000余，配合胡宗南和王陵基所属窜到西康的残部向雅安进攻。当时我和文健各率刘文辉起义部队一个营，奉命前往进剿（吴、文两营49年12月随刘文辉起义）我营因久驻名山，对任和平等匪徒在名山培植反动骨干，组织土匪武装的情况有所了解，我离开名山时，曾将敌情面告施旭（原地下党）请他转知新来名山的县长苏兴。我部离开的第二天，车岭乡的匪首郑成周率领匪徒1000余人包围名山县城，并放火把城外东街全部烧光，受害群众好几百人。

我与文健率部到达雅安与芦山之间的飞仙关时，正遇起义部队西康保安团与来犯的匪军对峙。飞仙关公路一侧悬崖陡壁，一侧万仞深涧，我和文健营走崎岖小路，攀藤拉葛，绕到匪军后侧，趁匪不备，进行攻击，挫其主力。奈时近黄昏，森林茂密，无法进剿。翌日拂晓，两营开始火力搜山，激战数小时后，匪徒溃散。又奉刘元瑄军长命令：剿匪任务交解放军接替，吴、文两营立即返雅安大兴场集中，由西康军管会派来的军事代表团黄荣忠团长率领到大邑学习。

24军在军代表的领导下，向邛崃北上。刚过了名山境，沿途公路两侧隐藏的土匪疯狂向我军袭击，我们且战且走，直到黄昏，才行程几十里。第二天又是整天的时停时打，到了晚间才到

了邛崃以南的土地坡高地。正值土匪包围土地坡，将党领导的川康游击队干部谢绍华、杨家寿等五六人全部杀害在该地。我营即向该匪袭击，才战斗一小时，该匪即溃逃。在这两天的战斗中，我师的参谋长黄祖鑫阵亡了。我部伤亡几十人。

我军到达邛崃县城的前两天，正是崇、邛、大诸股匪数千人包围了县城。城内守军是党领导的川康游击纵队所属的三个支队和解放军一个连，他们已坚守了七八天了。我们到达后，四郊都还有顽匪在公路两侧，我军派少数部队在夜间出击过两次，使公路暂时畅通了。

这次土匪暴乱与一般战斗不同，匪是乌合之众，并不存在什么主力，如遇部队进剿，人枪即分散隐藏。善良群众，不敢向解放军吐露丝毫匪情，否则全家被杀。

24军到了崇庆，大邑，该地的恶霸余如海，黄光辉，郭保之等股匪徒仍在猖狂地向新建立的乡村人民政权进攻，抢劫仓库。我们又在崇、大两地剿匪。邛崃的乔子均暗中派人在起义部队中造谣，挑拨起义的少数军人与军事代表的关系，煽动叛乱。因此在24军中的杨得春、刘述云、王廷（都是连长），受其蛊惑而叛变，杨得春被乔子均委为独立旅长，与刘述云、王廷一起，伙同乔子均搞暴乱。杨得春后被击毙，刘述云、王廷被擒获押送大邑枪决。被擒获的排长刘俊曾供出：杨得春叛变时在羊场同一些匪首开会，有人说，“蒋介石拥有美式装备的800万军队，都打不赢共产党，我们要和共产党硬拚最终目的是啥呢”？又有人说，“蒋总统一定会反攻的”。有人又问：“既要反攻，又何必逃台湾呢”？最后决定，我们打不赢，就多拖几年的摊（当匪），以后招安还是团旅长嘛（军阀割据时期的惯例，是匪招安为军的很多）。

早在1949年秋季，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飞来成都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反动武装，当即委成都稽查处长周迅予（叛徒、军

统重要骨干、袍哥飞诚社总舵把子）为“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但周比其他土匪要狡猾得多，他知道蒋介石的正规军，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他率领的纵队，只不过是少数武装特务和正诚社的一些兄弟伙，也是一触即溃的，只想借打游击把队伍拖到崇山峻岭隐藏一段时间，再配合蒋军的所谓“反攻大陆”，捲土重来，因此成都刚刚解放，他就携带电台及一些物资往松、理、懋方向逃窜。川西土匪暴乱时，他企图利用险峻的地形，使解放军大部无法施展其威力，如果少数部队进剿则可与之周旋，苟延残喘两三年，既可以使蒋对他格外垂青，又可以在国际舆论上表示国民党在大陆还有军队。因此，周迅予把已经投诚了的十六区专员何本初拉到一起跑小金，恰好国民党104师师长傅秉勋也带领着几百名残兵败将来到小金，三股合流后，受到蒋的赞赏。台湾“国防部”用飞机空投保密局电讯大队长张祇山（山东人），工作人员王德永、林德铭、田敏、除武器，手摇发电机和大量银元外，还投下很多空白委任状，首先就填写了苏永和为××总司令（苏是阿霸州少数民族的首领）。

也就是前面提到的1950年3月，蒋经国顾祝同在西昌召开的那次会议，周迅予闻讯后气焰更加嚣张。到了1950年底，成都公安部门特派已经投诚而又愿意立功的原警察分局长范伯居到汶川，向周迅予晓以大义，要他自新，周执迷不悟，为了向台湾表示忠诚，公然用发报机向台湾请示后，将范伯居枪杀。又遵照台湾的指示，在懋、汶的山林绝谷下开办了“国防部青年工作人员认训班”，还招收了20多名没有文化的彝族青年受训。

1952年冬季，原青海马家军被解放军击溃后的一部份残匪，由马良率领，得到台湾指示后窜到松潘郎毋寺与周迅予、何本初、傅炳勋等会合。几股匪窜到一起，在汶川被解放军重惩后来到芦花、黑水。在苏永和（人称“黑水王”）的帮助下依靠地形的险峻，抗拒解放军的进剿，双方共死伤千余人。

所有川西大杂烩的叛匪，虽然嚣张一时，但在党的军事围剿，政治瓦解同时并行下，各路土匪纷纷自首投诚，缴械自新。川西各匪纷纷土崩瓦解，周、何、傅、马等匪被阿霸藏族首领华尔功成烈押交解放军。在解送成都途中，除傅秉勋坠河身死外，其他都归案了。

注：本文作者原在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先生领导下于1949年在名山以中校营长随军起义，在土匪暴乱时，曾奉军长刘元瑄命令参加剿匪。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注意在政府参事室适当安排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他们的咨询作用。”这就把参事室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范畴，明确了参事室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摘自国务院副秘书长常捷《在全国参事室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 围剿广安郑启和武装始末

焦 汝 敬

1941年夏天，在四川境内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就是围剿广安郑启和武装。当时我在95军新九师李洪涛旅任旅部参谋，亲身参与了围剿计划和行动。现将此次事件真像始末，就我回忆所及撰文介绍如下。

## 郑启和其人

郑启和号治安，四川广安县人，系封建帮会头目。性情暴戾，为人多疑。虽在辛亥革命时入同盟会，率部参加过推翻清王朝的战斗，但反正后却聚众于华莹山，占山为王，独霸一方，当时人称“郑大王”。袁世凯称帝时，郑受川军熊克武招抚，先后参加护法、靖国等战役，擢官至师长之职。靖国军失败后，他又率其余部重回广安原籍，继续前践，为地方人士所不满，遂共起而排挤之，曾一度被迫离开广安。四川军阀混战不久，郑乘机窜回广安。鉴于过去遭受地方其他势力排挤之教训，回来后便积极发展武装，扩充实力，恣意寻隙报复，人皆侧目而视，就连他的下属旅长谌克纯及杨家将（杨森的子侄辈）都不敢惹他。经过多年的经营，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他终于把以华莹山为中心的方圆近百里地区，建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广安县渠江以东，戴市、打锣湾、天池……等地。俨然成了广安境内的“独立王国”。

1938年夏天，95军奉命接替川北地区的绥靖任务。根据川康绥靖公署的指示，把防范重点指向华莹山及其周围地区，尤其要特别注意广安的郑启和及邻水的包平章（原川军旅长）两股地方武装势力。但鉴于地方情况比较复杂，特又叮嘱：除地方一般治